

人兽变形神话中的女性身体改造与主体性建构：拉弥亚与白娘子

Female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in Metamorphosis Myths: the White-Snake Lady and Lamia

张 欣 (Zhang Xin) 赖琦琳 (Lai Qilin)

内容摘要：蛇化女子与人类男性相恋是中西神话传说中共有的母题，而其中白娘子和拉弥亚两个文本链构建了此类人兽变形形象的突出代表。二者在女性身体改造过程中的相似性和在主体性建构中的差异性，构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艺术张力和伦理反差。二者通过蛇身变形凸显了女性身体被淫邪化的共同困境，而白娘子通过身体改造不仅摆脱了身体困境，还获得了人类女性伦理意识启蒙和女性主体性身份建构；而相形之下，拉弥亚的“蛇之淫性”却始终没有褪去，始终是男性欲望的隐喻载体和男性主体性文化建构的陪衬物及附属品。两者的主体性差异折射出东西方对“爱欲”主题的差异性阐释。白娘子文本链所展现的东方之“爱”聚焦于宿命姻缘和伦理忠贞，而拉弥亚文本链呈现的西方之“爱”则在感性与理性、欲望与克制等二元之物的此消彼长中繁衍生息。

关键词：白娘子；拉弥亚；身体改造；伦理意识；主体性建构

作者简介：张欣，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西戏剧比较和美国文学研究。赖琦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项目“中西神话视域中的女性伦理取向研究”【项目编号：2018WTSCX02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emale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in Metamorphosis Myths: The White-Snake Lady and Lamia

Abstract: The White-Snake Lady and Lamia are two highly responsive mythical and legendary images of metamorphosis and romantic love, but they displa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Both serpent bodies suffer the same physical and metaphorical dilemma of being defamed as seductive and obscene. However, due to the White-Snake Lady's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she has achieved not only a human body, but also a human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By contrast, Lamia, with similar storylines and dramatic conflicts, fails in the pursuit of human identity with her never-sub-siding serpent obscenity. While the White-Snake Lady remains the protagonist of her legend, Lamia in her myth is at most a foil for the male figures representing rational power and temperance. The two legends of love, with highly similar plots, represent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toward love themes, with the Eastern myth focusing on doomed marriage and feudal ethical codes, and the Western version centering on such dualities as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desire and restraint.

Key words: the White-Snake Lady; Lamia;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ethical consciousness;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Author: **Zhang Xin**, Ph.D.,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er of literary studies at Center for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drama studies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zhanghao20041001@126.com); **Lai Qilin**, is M.A. candidate of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迄今为止,对中西神话中“蛇化女子”与人间男子相恋这一传说的研究不乏其数,聚焦点则明显集中在中国白蛇传故事和西方拉弥亚原型的比较研究上。由于两段故事无论在基本内容还是在人物结构上,都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作为历代相传的集体共享型故事,两个神话形象在各自所属的文学传统中都被视为故事原型,不断得以重现和重释。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往往会从“蛇化女子”传说故事中抽取普及度和重要性相匹配的两套文本链进行比较研究。一套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费洛斯特拉图的《阿波罗尼传》(*Apollonius*),到17世纪英国作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剖析》(*Anatomy of Melancholy*),进而到19世纪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笔下的叙事诗《拉弥亚》(“Lamia”)形成的“拉弥亚文本链”。与之形成强烈呼应的另一套文本链则是中国文学中衔珠报恩的“白娘子”形象。关于这一文学形象的文字记载始于东晋史学家干宝的《搜神记》,再现于唐宋时期的小说话本中,进而经17世纪明代冯梦龙话本《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清代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1771)奠定了白蛇传人所共知的故事格局。盛行于20世纪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拉弥亚和白娘子比较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使一系列与此母题相关的文学再现文本都被囊括在共同的“移位”神话体系中进行整体性和互文性观照。迄今相关的比较研究主题包括原型的演化历程、象征结构以及伦

理取向，也不乏少数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成果，侧重展现“蛇化女子”在中西文化中对情欲和感性的性别隐喻。在对两套叙事文本链的比较研究中，济慈的拉弥亚和方成培的白娘子被视为匹配度最高的版本，成为两条文本链的核心交点。

变形神话是中西方古代神话类别中共有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在神话流传和发展中却显现出明显的民族差异性。从好色的主神宙斯开始，希腊神话中的变形绝技往往成为满足原始欲望的绝佳武器，反映了人类避苦趋乐的天性。而从女娲到大禹，从夸父到精卫，保存至今的中国变形神话却折射了寡欲治国、建功立业的儒家理想。无独有偶，拉弥亚和白娘子的“蛇女”叙事传统也是中西女性神话中共有的叙事模态，承袭了中西古代人兽互渗的变形神话文学原型，但二者通过女性身体改造和女性性别身份却展现了迥然相异的伦理价值取向。

一、“蛇之淫性”与女性身体改造

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领域和普遍的精神机能，神话原型一直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流淌在人类文学的血液中。始于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社会中并未消亡，只不过改变了以往神话的存在形式，甚至借用现代科技和科幻想象作为神话的构成元素和换装面具，使神话传说和人工智能之间形成了互文关联。人兽合体和人兽变形的神话想象与当下人工智能的研发创想，究其本源，都可视为人类对自我“身体”所进行的想象性和实践性改造。而在这种改造过程中，“身体”的“物质性”和“文化性”都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身体”作为当代文化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时而被藏匿于灵魂和理性的阴影之中，时而又在尼采式惊世骇俗的非理性主义话语中显露光辉。在文化研究话语中，“身体”已经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肉体组合，而是承载丰富意象、多层隐喻和浓厚意识的文化概念，是承载主体性和符号意义的个体和社会存在。“身体既是一个被表现的客体，也是一个有组织地表现出概念与欲望的有机体，两套表现系统相互缠绕和重叠，所有的社会都创造理想的身体意象用以定义自身，社会身份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怎样察觉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卡瓦拉罗 105）。“身体改造”是白娘子和拉弥亚故事链叙事模式所共有的母题。从“蛇妖施法改造身体”到“蛇获人形与人相恋”，进而“遭遇外力蛇形暴露”，直至“爱情湮灭姻缘破裂”，在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人妖爱情悲剧叙事模式中，女性身体的改造和复原成为贯穿故事的核心脉络，充分显现了女性动物性和女性身体改造的主题。

身体以及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贯穿西方哲学传统始终的核心命题，在 20 世纪中期西方学术研究“身体转向”浪潮中被推至声名显赫的位置，而身体政治与文化建构之间也随即形成了强有力的纽带关系。“身体的生物性特质常常被对立与精神的崇高性，身体与精神之间的顽强博弈不仅

彰显出人们对于自身存在本质所特有的持续探索，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权力结构、社会样态和文化表征”（刘岩 128）。从荷马时期对人体的赞誉，到希腊古典时代哲学家对精神（灵魂）的崇尚以及对身体的贬损，进而到近代以笛卡尔为先驱的“身心二元论”，都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并派生出“属性二元论”等流传甚广的二元论范式。其中，生物性别二元论和社会性别二元论成为 20 世纪后结构主义直面的挑战。由于两性在人类繁衍过程中的生理分工差异，女性生命力大部分为延续物种所耗费，使得身体之于女性主体性的意义远大于男性，女性成为较男性更从属于物种的性别，进而具有更高的动物性。女性动物性在白娘子和拉弥亚的动物之身和“蛇性之淫”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蛇化女子”通常与人性中的动物性本能和非理性欲望形成紧密的文化意指关联。费洛斯特拉图《阿波罗尼传》中的拉弥亚是一种人首蛇身、吞食孩童的妖怪，嗜血的欲望和赤裸的肉欲形成了强烈的意象关联。随着历史的演进，拉弥亚渐渐变得温顺多情，在伯顿和济慈笔下进行了成功的身体改造，获得了天真可爱的少女形象，并成为了“悲哀的爱”的牺牲者。然而，拉弥亚“蛇性之淫”的烙印并没有完全消除，她暗恋青年学者李修斯（Lycius）却不得亲近，因此通过与迷恋林泉仙女的天神赫尔墨斯（Hermes）¹ 进行交易换取了美女之身，从而得以亲近李修斯。故事由天神和女妖的欲望为起点展开，以双方的交换而各成其愿，感性和情欲成为故事情节延续的助推力。神性与妖性在欲望和感性中融合共谋，充分显现了希腊文明中避苦趋乐的人性，“蛇之淫性”也得以彰显。

拉弥亚和白娘子在形象演变与故事情节上的高度契合已经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二者在身体改造中显现的女性身体困境，却显现出极具价值的差异性。中国白蛇传奇以《搜神记》为始端，打造了“衔珠报恩”的故事原型，也解析了中国文化中有关“蛇兆吉”和“龙（蛇、水）为贵”的由来。与身份卑微的拉弥亚不同，白娘子贵为骊山老母²之徒，得观音菩萨点化，用千年修炼之身圆人间未了姻缘，使白娘子身体改造的历程褪去了“蛇之淫性”和妖性之恶，饱含天命之贵和人伦之暖。从明、清直至现代，白娘子形象已经逐渐演化为真、善、美的化身，与许宣（许仙）的姻缘也褪去了唐志怪小说中蛇妖所隐含的色欲禁忌的喻示。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家喻户晓的电视剧版《新白娘子传奇》中女扮男装的许仙深入人心且毫无违和感的原因，因为女体许仙及其性别表演进一步淡化了“蛇性之淫”的蕴涵，纯化了这段天作之合的爱情姻缘。拉弥亚和白娘子由“蛇性之淫”的始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并在二者身体改造过程中显现出迥异的女性身体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

1 赫尔墨斯是宙斯之子，商旅、变戏法的人和窃贼的保护神，被评论家戏称为“成功的流氓”（Boulger 250）。

2 骊山老母，又称黎山老母，是在古代神话中由女神崇拜而塑造出来的女神形象，传说她是女娲的坐骑，亦传她是女娲的一个化身。她地位极高，以教化人的圣母和法力无边的师傅形象频繁出现于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中。

建构面貌。和众多的希腊神话女性人物一样，海神之女拉弥亚的变异也是由孽缘所致。拉弥亚原为主神宙斯的情妇，被妒火中烧的赫拉灭后并施咒，沦为半人半蛇的怪物，还落下个忆子成狂、吞食孩童以解心头之痛的恶习。拉弥亚对血液的饥渴、对孩童的吞噬，打造了她不洁和蛮愚的刻板形象。拉弥亚与李修斯未得正果的两性（人兽）结合，实质上是蛇女拉弥亚代表的感性和哲人阿波罗尼代表的理性的博弈。柏拉图的信徒李修斯原为理性教化的产物和传承者，但难以遏止的情欲使他被拉弥亚的少女幻象所迷惑，而他急于展示的虚荣又将这场幻象引致幻灭。而济慈将著名的“赫尔墨斯插曲”¹引入伯顿的拉弥亚叙事框架中，让沉迷于爱情游戏的“爱的窃贼”赫尔墨斯与巧舌如簧的拉弥亚一拍即合，通过交易获得对方的协助，满足各自的情欲，让读者在拉弥亚身上看到了诱骗夏娃的撒旦的影子。赫尔墨斯和拉弥亚的交易已然成为济慈版拉弥亚叙事的始端和点睛之笔，也使二者在“引诱者”和“入侵者”的形象上达成一致。但读者不禁会问，拉弥亚作为被诅咒的蛇妖，以何资本与贵为神祇法力无边的宙斯之子进行交换呢？《拉弥亚》长诗开篇交待了拉弥亚具有隐匿林中仙子的法力，在其后她也展示了不少装点婚礼的法术，但都只能称得上是雕虫小技，与赫尔墨斯不可同日而语。但在“神无完神”的希腊神祇家族中，十二主神之一的信使赫尔墨斯也不得不因为疯狂钟情但不得而见的林泉仙子，而与最高法力仅限于隐匿仙子的拉弥亚实施交易。由此可见，与白娘子“衔珠报恩”的义举截然不同的，拉弥亚出卖林中仙子换取人身和爱情的行为实为背信弃义的道德失义。也正由此，当“蛇性之淫”在白娘子由蛇形获人形的过程中被消解殆尽之时，拉弥亚的变形则延续了其蛇性的本质，较之变形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白娘子通过身体改造，摆脱了蛇形躯体的困境，获得了作为人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体身份；则相形之下，拉弥亚获得的美女之身并未真正使她（或仍应称为“它”）走出身体和精神的困境，也未能实现其从兽到人的转变，也就更加谈不上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了，其“蛇之淫性”并未被“人之善性”所取代。

二、“人之善性”与女性主体性建构

正如聂珍钊教授在其建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中所指出的：“能否分辨善恶是辨别人是否为人的标准。善恶的概念是与伦理意识同时出现的。善恶一般不用来评价兽，而只是用来评价人，是评价人的专有概念。因此，善恶是人类伦理的基础”（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4）。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中的善与恶这双二元对立的衡量标准，可

1 济慈长诗《拉弥亚》前145行是西方评论界所称的“赫尔墨斯插曲”（Hermes Episode），讲述了拉弥亚通过交换的手段受到奥林匹斯神赫尔墨斯的帮助，化为美女并得以与李修斯相恋的序曲。“赫尔墨斯插曲”被学界普遍认同为济慈创作的拉弥亚形象的有力注解，是济慈对伯顿笔下已经成型的拉弥亚故事架构的重要添加元素，并使原本淡薄的美女蛇色诱无知男的老套故事变得深厚而复杂。

以帮助我们厘清中西两个蛇女传说最为本质的差异性。首先，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提及的“善”与“恶”的概念，是“世间善”，而非出世间的至善或真善，因为后者是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恶”的。其次，“世间善”分为内善和外善，即心善和行善。而外善或行善必须有对象方能成立，其具体层次可分为“不害”和“利人”。所谓“不害”，就是我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利人”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可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常说的“独善其身、兼善天下”的“仁道”。

运用这种善恶的尺度，我们不难发现，拉弥亚在由蛇身变幻为人身的过程中，仅仅只是获得了引诱和取悦李修斯的“人形”而已，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正如拉弥亚在诗中所言：“我爱一个哥林多青年——多幸福！把我女人的形状给与我，放我在他所在的地方”（济慈 181）。诗作开篇，拉弥亚对赫尔墨斯极尽阿谀恭维之能事，将迷情寡欢的赫尔墨斯一步步引入自己预设好的圈套，进而使李修斯也落入设定的情局。但不可否认的是，拉弥亚自始被施予“人形”，被置于“他地”，始终是赫尔墨斯所代表的男性占有欲的附属品，同时也是阿波罗尼代表的哲学理性的牺牲品。拉弥亚在这场交易中，不过是暂时获得了迷惑李修斯的幻影，婚礼上当面对阿波罗尼令万物枯萎的目光凝视和无以阻挡的“一条蛇”喝令时，她“惨叫一声后便烟消云散了”（211）。此处，阿波罗尼与法海的相似性不言而喻，是两个故事链最具说服力的汇合点。但通过细致的文本梳理不难发现，法海对白娘子的“收复”远比阿波罗尼对拉弥亚的“制服”要艰难波折得多。拉弥亚运用巧言善辩之功，得以借助赫尔墨斯帝王之身而不得仙子之爱的郁郁寡欢之际，挑起赫尔墨斯男性占有欲不得满足的饥渴，获得了出卖林中仙子换得美女之身的机会，并在李修斯必经之路上施以幻术诱骗“爱情”。而这一系列的雕虫小技在阿波罗尼的目光中化为乌有，无计可施，使得故事结局部分情节单一、节奏简洁。相比之下，白娘子与法海的斗法可谓一波三折、情节多变。这种情节设置上的巨大反差，不仅仅呈现了中西文学创作与审美习惯的差异性，更突显了白娘子“为人”的善恶意识和“为女人”的性别身份建构历程。白娘子故事中，从游湖借伞到缔结姻缘，从端阳现形到昆仑盗草，从水漫金山到法海合钵，直至状元祭塔，这些耳熟能详的桥段细致描绘了白娘子为人、为妻、为母的完整身份建构历程。很多比较文学研究将白娘子被镇雷峰塔下作为与拉弥亚烟消云散相对应的结局，许宣对应李修斯，法海对应阿波罗尼，妻离子散对应灰飞烟灭，使两个故事的高度匹配性一目了然。但细读两则故事的终结点却有截然不同的发现，也印证了两个故事截然相反的走向。西方学界的拉弥亚迷们从未停止为济慈笔下这位“爱情的牺牲者”寻求一条活路。对拉弥亚一声惨叫后消失的结局，有学者认为这为拉弥亚凄美爱情故事续写埋下了伏笔，拉弥亚消失的人形不一定意味着拉弥亚的死亡或是她与李修斯爱情的终结。一种推断认为，拉弥亚有可能飞回到老巢疗伤，伺机东山再起。这种设

想让中国读者不禁联想到神话故事中“百折不饶”的“白骨精”，她们不断变幻人形来迷惑男性，驱之不散，无疑强化了拉弥亚的“妖性”，也进一步显现了拉弥亚“妖性”和白娘子“人性”的本质区别。另一种推断则认为拉弥亚和李修斯被拆散的肉体在灵魂深层结为一体。这一推断的牵强之处显而易见。李修斯对拉弥亚外表的迷恋引发了二者肉体的结合和依恋，在走向灵魂之爱的道路上还没出发已经遭遇厄运，故事情节描述丝毫无法为二者灵魂结合之说提供有力的证据。由此看来，拉弥亚读者的善意只是徒然，而相形之下，白娘子的故事结局则显然蕴含了“由悲转喜”的伏笔，“妻离子散”也决不是白娘子故事唯一的终结。自“白蛇被压塔下，许仙变心出家”的悲惨结局之后，又有了“状元祭塔，母子相会”的温情场面和希望延续。

相比拉弥亚巧舌如簧的预谋和人形幻灭的结局，白娘子的“善心”与“善行”成为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经观音点化下凡报恩，与许宣缔结姻缘，助许宣治病救人，诞下子嗣许仕林，白娘子自始至终坚守着“行善报恩”的初衷。法海法师随着白蛇传说在中国民间的广为流传，在“只羡鸳鸯不羡仙”的语境下，也被披上了“法海你不懂爱”¹的顽石刻板形象，落得人神共愤的境遇。但相比阿波罗尼对拉弥亚的绝对强势，法海与白娘子在法力上则是旗鼓相当，不分伯仲。关于法海和尚的来历版本繁多，但无论是以降妖除魔，拯救苍生为己任的法海大师，还是为报私仇，穷追不舍的法海和尚，这一角色在白娘子女性主体性建构中起到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法海设阻，才使白娘子在为人、为妻、为母的道路上遭遇困境和挑战，也正因为此，法海的“设阻”更加凸显了白娘子的坚忍和执着，展现了其“善心”和“善行”，成为白娘子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助推力。

白娘子最突出的“善”的对象自然是许宣。她信奉姻缘宿命的中国伦理范式，获救报恩以身相许，下嫁底层贫寒书生并恪守为妻之道，遭遇背叛仍忠贞不移。有当代读者将白娘子对许宣的“善”称为“愚善”，表达了读者对白娘子的喜爱和同情，但“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19）。在婚姻论财之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在许宣把持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备心理并屡次背叛的婚姻现实中，“世俗婚姻波折坎坷，恰恰成为白娘子由蛇精获得为人、为妻、为母的伦理身份，进而完成其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此消彼长的孕育土壤”（张欣 117）。白娘子对报恩的执着是其人性建构的根基，而其对婚姻的忠贞是中国封建女性主体性的重要组成。相形之下，拉弥亚与李修斯凄美哀怨的爱情故事，则更多展现的是征服和屈服的关系。拉弥亚用美女之身征服了理性主义传承人李修斯，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老师阿波罗尼用更坚定的理性使拉弥亚代表的感性幻影灰飞烟灭。这一征服与屈服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赫尔墨斯插曲”中早露端倪。很多评

1 “法海你不懂爱”是国内流行乐坛走红一时的一首通俗歌曲的标题。

论把赫尔墨斯对林中仙子的追逐简单定义为纯粹的爱情游戏，但善用骗术的“赫尔墨斯钟情于林中仙子并非因为她的某些品质，而是因为她众多的追求者赋予了她价值”（Reiman 63）。彰显男性尊严的占有欲和对女性征服后的成就感无疑是赫尔墨斯委身与拉弥亚交易的驱动力。由此看来，白娘子和拉弥亚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性爱情价值取向。

三、爱的变奏：两性之爱的东西诠释

在希腊文中，“爱”一词就有三种不同的类别，即 eros（欲爱）、philia（智爱）和 agape（圣爱）。始于希腊哲学理性时代的拉弥亚形象，是哲学家费洛斯特拉图《阿波罗尼传》中与理性对立的“欲爱”的象征。在希腊神话中，爱无疑是与原始欲望，特别是与性欲和生殖力紧密联系的，而追逐与征服则是与希腊欲爱密不可分的孪生物。除了词源学中“欲爱”（eros）一词的来历以外，希腊爱神厄洛斯（Eros）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也被赋予了夺人心智的魔力。“在不朽的诸神中数他最美，能使所有的神和所有的人销魂荡魄呆若木鸡，使他们丧失理智，心里没了主意”（斯威布 27）。显然，拉弥亚对哲学青年李修斯难以遏止的爱欲和占有欲显现了趋乐避苦的希腊欲爱模式，表现了自我欲望与满足的扩张，表达了爱欲中占有和征服的内驱力。在拉弥亚故事的基本叙事中，由阿波罗尼代表的希腊哲学时代的“智爱”无疑完胜了拉弥亚所代表的不堪一击的“欲爱”。所谓“智爱”，就是对智慧（知识）和真理的爱。希腊哲学传统构建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结构，无疑将由理性主宰的灵魂置于被欲望所驱使的肉体之上。希腊哲人所推崇的理性生活则是把理性视为掌控自然冲动和肉体欲望的原则，将自然欲望纳入理性秩序之中。拉弥亚在阿波罗尼目光凝视下的消亡，正是欲望屈从于理性的象征，也是幻影臣服于真理的艺术再现。济慈长诗《拉弥亚》则通过巧妙添设的 145 行诗“赫尔墨斯插曲”将同样被欲爱所驱使的魔法偷盗之神赫尔墨斯与拉弥亚并置，突显了拉弥亚爱情悲剧的欲爱之源。然而，深受文艺复兴浸润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对拉弥亚传说的迷恋和续写，则更多缘于诗人对拉弥亚式感性和直觉的崇尚，以及对科学理性至上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抵御。自文艺复兴后，超出自然欲望和理性认识的宗教“圣爱”经历了世俗化的转化，人的感性得到了肯定，“爱”成为与个体息息相关而且触手可及的强烈情感。济慈笔下的拉弥亚被赋予了更多人类女性的特质，成为了人类“情爱”的代言人。这种“情爱”既能使诗人坠入情网、品尝爱的甜美，又能使诗人跌入痛苦的深渊，感怀伤逝。这种“情爱”就是我们常说的“love”。拉弥亚形象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经久不衰折射了西方文明中爱的变奏。她由希腊神话乐园走向希腊哲学殿堂，进而走进浪漫主义诗作中，呈现了由“欲爱”到“智爱”，直至“情爱”的变迁。这一变迁体现了情感来源和情感对象的流变。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对立以及二者在情感驱动力中的此消彼长构成了西方多元爱情观的本质差异。而情感施

与对象从客体世界（即表象）到本体世界（即真理），从超自然的博爱到触手可及的世俗之爱，则构成了西方爱情观的多元结构。

华夏文明也同样不乏悠久而厚重的爱情传统，既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婉约，也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炙热，而“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忠贞和“执子之手，相濡以沫”的浪漫则是华夏爱情观最具代表性的表达。这种由“爱情”到“亲情”的升华也是华夏农耕文明和安居意识的集中体现。白娘子的传说从下凡报恩开始就深深刻上了华夏文明对“爱情”的诠释。爱情是与姻缘宿命、伦理纲常、忠贞奉献等密不可分的。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被视为白蛇故事链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版本，在情节上较前人做了适当增减，为现代白蛇故事奠定了基本格局。方成培版本的“前故事”交待了捧钵侍者许宣和白蛇的宿缘，以及法海在孽缘完满之日方可点悟许宣的故事定局。这一故事架构为白蛇的下界和法海的纠缠找到了前世宿命的合法性，也为故事结尾白娘子和许宣的双双得道寻找到了合法性。除此之外，方版开篇的《开宗》与终篇的《佛圆》，首尾呼应，“佛起”而“佛结”，使爱情故事嵌套在宗教叙事框架中，展现了浓郁的宗教意蕴。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都成为了“宿缘未尽”的艺术表现。结局《佛圆》既没有带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也没有走向拉弥亚式的凛冽凄美，而是以白娘子得以宽赦超生和许宣点化得成正果而终结。使读者感悟爱情的力量之余，更被宗教宿命的威严所震慑，强化了姻缘宿命的伦理意蕴。“许身报恩”的白娘子形象高度契合了华夏主流文化中女性贤良淑德的性别伦理观念。而市井商人阶层的许宣在这场爱情中充分体现了“利”、“欲”二字。尽管白娘子和许宣的婚姻折射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底层婚姻的模式，但白娘子对“夫为妻纲”的坚守却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折不扣。这不仅仅体现在白娘子对世俗婚姻波折坎坷的坚忍，对许宣重利多疑软弱背弃的隐忍，更表现在白娘子折损道行为许宣繁衍后代的修为。

我们不难看出，拉弥亚作为折射男性感性和欲望的客体，其自身作为欲望隐喻载体的功能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对拉弥亚的遏制和毁灭，意味着西方文明挣脱原欲、追求理性的诉求。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拉弥亚的故事实际上是李修斯的故事，是摆脱原欲驱使走向理性的西方文明的故事。相比之下，白娘子的主体性地位则从未遭遇撼动。白蛇故事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无论在民间传说经典化的进程中，还是在后世改编再现多元化的过程中，白蛇“妖性”和“人性”的此消彼长始终是不同版本共同聚焦的主题。白娘子对于婚姻关系的执著维护，是区别于白蛇精传说的核心文化内涵，“标志着白娘子形象由沉迷性欲的‘妖性’向追求人类爱情婚姻稳定伦理关系的‘人性’的本质性转变”（张欣 114）。由此可见，白娘子和拉弥亚的女性主体性建构是在与男性人物的关系建构中完成的，白娘子和拉弥亚由蛇到人的转变也显然是女性身份和主体性建构的神话隐喻。借助女性主义和身份批评的视角，我们不难从白娘子蛇体、女体到母体的演化历程中抽取出华夏文明对“何以

为人”、“何以为女人”和“何以为母亲”的身份思索。无论是借用道佛之争和情法之争为故事发展推波助澜的法海大师，还是前世施救，今生相恋的“弱男子”许宣，都显然成为了白娘子女性主体性形成和完善过程中的陪衬。相比之下，拉弥亚和她本应守护的林中仙子却都成为了男性感性欲望与理性无情的陪衬物和牺牲品。拉弥亚从蛇体到女体直至瞬间化为乌有的过程，更大程度上是作为男主人公李修斯男性身份建构的映像而存在，是男性主体性文化建构的附属品。这种女性主体性的强烈反差无疑成为中西蛇女传说最显著的分化。

Works Cited

- 卡瓦拉罗，丹尼：《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Cavallaro, Dani.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rans. Zhang Weidong etc.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2006.]
- 济慈：《济慈诗选》，朱维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 [Keats, John. *Poems by John Keats*, trans. Zhu Weij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3.]
- 刘岩：“女性身体的文化规约与意义重建”，《外国文学》4（2015）：128-34。
- [Liu, Yan. “The Cultural Constraints an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Body on the Theoretical Thresholds of Judith Butler and Luce Irigara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5): 128-34.]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1-13。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 Reiman, Donald H. “Keats and the Humanistic Paradox: Mythological History in ‘Lamia.’”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11(1971): 659-69. (Web. 4 Jan. 2009.)
-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Schwab, Gustav. *Greek Myths and Legends*, trans. Chu Tun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 张欣：“‘白娘子’和‘美人鱼’的斯芬克斯之谜与伦理选择”，《外国文学研究》3（2018）：110-9。
- [Zhang, Xin. “The Sphinx Riddle and Ethical Selection in the Images of the White Snake and the Mermai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2018): 110-9.]